

◆流年碎影

1970年代的九一六中学

毛天鸣



1970年代的田间实习（作者供图）

上世纪60年代，安庆有条幸福路，东西向，从二郎巷笔直沿至龙门口。路的西端有所学校叫九一六中学，即安庆一中。这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唯一中学，改校名正是为了纪念这件事。

我是1974年读高一第二学期时由四中转入该校的。学校坐北朝南，两头高，中间略低。东西接中医院、池州军分区（古旗楼），北抵军分区大操场、高琦小学，除一家粮站和几家小店外，四周皆是民房。从校大门（清末建）进入，门口花圃中央挺立一棵近百年的罗汉松，苍翠欲滴。更显眼的是北面一棵高大的百年银杏。东南面有两处别样景点：一个是四合院（时为教师宿舍），原清末贡院旧址；另一个是毛主席视察学校纪念馆，原称“红太阳展览馆”。

在“批林批孔”及“学朝农”的时代背景下，学校大搞开门办学，“学工学农学军”，让学校小课堂变成社会大课堂。为了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，学校组织师生到校办工厂、农场参加生产劳动，并与安庆农机一厂、市机床厂、轧钢厂、向阳生产队等10个单位建立挂钩关系，请贫下中农、工人、解放军和老红军进行忆苦思甜、长征精神教育及军事基本训练，又在农场创办安庆九一六中学分校，设政工、农用数学、农业技术、农用机械等课程，在工厂办半工半读班，设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课程。

我有过两次“学工”经历，每次为期一个月。头年在安庆地区农机厂（今活塞环厂）翻沙车间，学筛沙、做沙型，浇注模具，清理铸件。翻沙工又脏又苦累，对烧红的铁水尤为发怵。工人师傅的言传身教，使我克服了诸多困难，并从中锻炼了自己。文体活动也是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及亮点，除经常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外，还组建有若干校队。排球队、文艺宣传队负有盛名，男排曾代表省里参加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，并取得第八名的佳绩；宣传队创作了不少优秀节目，曾受市外事办邀请，在马山宾馆为石化厂的越南实习生举办演出专场，两个舞蹈节目都被选调到全市“三好学生”表彰大会上演出，还在市人民剧

院售票连续公演三天，引起巨大轰动。

篮球是最为普及的体育项目，同学们大都喜欢，玩法为半场“三人制”淘汰赛。逢课间十分钟、放学后，甚至星期天，都能看到同学们在球场上的身影。班级与班级之间也经常搞比赛，强队单挑论输赢，弱的班级联合组队参加，由于是正规赛，我常被邀去当裁判。

尽管受到社会上批“师道尊严”“智育第一”观、“读书无用论”等思潮的侵扰，及生产劳动过多的影响，总体上学校的文化课教学秩序相对平稳，政治、语文、数理化授课照常进行。五门主课实行开卷考试，同学们读书学习的热情比较淡薄，高二的最后一年，一些同学不背书包，直接将书本插在屁股后的口袋里。而老师们在三尺讲台上，兢兢业业上课，未敢懈怠。

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张宇宙，瘦高个，烟瘾大，课中犯瘾时，习惯性地掏出一支烟，又很快收回去，实在忍不住，便出教室在走廊上抽。英语老师张洪勇，戴一副眼镜，很儒雅，迎面遇见时，总冲我笑笑，我明白，也许与我一次用英语读了篇新课文有关吧。语文老师饶世栋，中山装风领扣始终扣着，精通国文，喜引经据典。有次写作文，我模仿课文《朱德的扁担》的叙事结构，结合农场劳动写了一篇，他阅后“朱批”大半页纸，赞赏有加，我有点受宠若惊。

短暂的高中生活里，有个很有意思又难以解释的现象，男女同学界线分明，似楚河汉界。处于青春期的我们，相互之间基本不交流。我还对一个现象感触颇深：在冷清的学习环境中，部分同学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，如我们班上的克志、务虚、东风、晓兴同学，尤其务虚同学，不仅课堂提问勤，而且下课都缠着汪老师解析难题，他们恢复高考后均考上大学。

1975年末，高二（6）班潘诚宏（校团委委员）等同学向全市应届毕业生发出“上山下乡”倡议后，我们随即告别校园，走向农村广阔天地。这期间，由于同学们纷纷忙于下放的事，加上通讯不便难以集中，我们高二（12）班没拍集体毕业照，至今想来，仍是憾事。

◆逝者追忆

爱唱黄梅戏的母亲

余招平

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年了。三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她，想得彻骨了，她便走进我的梦中。我梦到她把我买给她的麻花送给左邻右舍的孩子，她脸上堆满笑容，说这是你们招平哥从池州带回来的，吃吧！正当我想从堂屋的桌上为母亲拆开一袋时，发现桌上是空空的，转过身来，母亲不知去了哪里，堂屋空空的，没有一点声音。我使劲地喊：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不说话呀……

这个梦境让我非常心痛，我侧转身，泪水淌湿了枕头。

母亲是2018年11月30日离开我们的。那一天，距离她七十岁的生日还差一个半月。那一天，她把她一生的苦难带走了，把那个年代她顶住的贫困带走了，却把她对哥哥和我还有妹妹的爱留在人间。

母亲是那么疼爱我们，在那个生活拮据的年代，她把卖鸡蛋的钱塞在床底下的一个废旧的热水瓶里，用来换取我们的生活必需品。有一天，我无意发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，但我没有泄漏出去，也没有告诉母亲，而是在盛夏里看到有卖冰棒人吆喝走进屋场时，偷偷地从废旧的热水瓶里取出一毛钱来，去买上一根冰棒，满足我饥渴的欲望。后来，母亲发现了，并没有责怪我，她理解儿子的心，理解一个孩子的食欲。正是这样的无言，让我至今追悔莫及。

母亲年少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就已去世，她的母亲被迫改嫁。她带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弟弟，哭喊着追着她的母亲，在经过一条小河的时候，姐弟俩险些送掉了性命。好在

后来她的继父接纳了她们的姐弟俩。不是在原生的家庭中，多少有些被歧视，但母亲以她特有的坚强忍受着，忍到她在媒约之下认识我的父亲——一位乡村赤脚医生，她的生活才有所好转。但母亲苦怕了，她担心生活过不去，便省吃俭用，把省下来的钱花在她的三个孩子身上。每每生活苦不堪言时，她便用黄梅戏来为自己解压。母亲天生有一副好嗓音，唱出的黄梅戏特别动听。后来，我和哥哥都走上音乐这条道路，肯定是受到母亲的影响。我和哥哥考上了大学，跳出了农门，妹妹也嫁到了如意郎君。屋场上的人都说，我母亲育子有方，这是心地善良的人特有的好报。

苦难的生活在迎来翻页之时，母亲却罹患重病。我们把母亲接到河北和池州，请上最好的医生为她就诊，但也没能挽回她的性命。妹妹说，母亲常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零花钱塞给困难的亲邻。她自己需要一点零花钱，但从来不跟我们说。那些日子，每次回去，我只知道买一些母亲爱吃的东西和保暖的衣被给她，可没有想到，母亲还要做她的人情。母亲去世后，妹妹才告诉我，母亲想看一场大剧团的黄梅戏，又怕耽误我们的时间，想等我们日后有时间了，再提出来。她不允许妹妹告诉我们，怕我们为此影响工作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也没有把这个愿望亲口告诉我和哥哥。母亲的这个愿望，我们再也沒机会满足了，我只有带着无限的愧疚和遗憾，生活在没有母亲的这个世界上。

◆儿女情长

离 别

胡锋

去江苏跟班学习快两个月，我回了一趟家，与妻子带孩子玩了一天，又要踏上开往溧阳的火车。火车即将驶入车站，我叮嘱妻子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孩子，看着年幼的儿子扭来扭去调皮的样子，我紧紧地抱着他，告诉他一定要做个好孩子，儿子懂事地回应：嗯嗯。顿时，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坐在车厢里，我与妻子视频，主要是想看看儿子，看到他脸上难舍的表情，听到喊爸爸的一刹那，我担心泪水要溢出来，声音沙哑地告诉儿子：挂电话啊。

整个行程，我不时电话妻子，告诉她我到了哪里，询问她在哪个位置，重复着略显啰嗦的话语。到达溧阳后，行车接近办公地点时，我故意提前下车，再次电话妻子，告之我到了镇上，提醒她一定要照顾好孩子。我沿着公路边的人行道慢慢走向政府大楼，就是想借游览路边风景分散注意力，减少离别之“苦”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想想自己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，经常离家外出，从未像这次竟然流下了别

离的泪水。初来溧阳的那天，妻子和儿子送我出门，我满脸欢快地拒绝，妻子执意要送，还赠上许多祝福的言辞，而我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希望，没有一丝难舍难分。

我是一个自小就恋家的人，每次出门在外，不论多长时间，电话总要拨个不停，也没什么新词语，都是“吃饭没”“孩子在哪”“开车注意安全”之类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告诫儿子“要听话”“不要玩手机”，几乎都是儿子不耐烦地挂断电话，给我留下些许无奈。

妻子属于典型的农村妇女，善良贤德，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结婚十八年了。一路走来，因家庭贫寒，妻子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特别是两个孩子出生后，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成了她的全部，却从未听到一句怨言。作为家庭主妇，妻子特别尊重我、支持我，任何大小事情都会征求我的意见，对我所有的决定无条件赞同，即便我遭遇诸多烦恼事，听到的总是宽慰的语言。

忆起高铁站离别的那一幕和妻子满怀期许的眼神，我告诉自己，要用实际行动回馈她的付出，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。